

◎从“富国强兵”到“全面小康”

◎全面小康的社会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

◎把中国社会发展引入制度文明建设的理性轨道

◎构筑社会主义本源制度文明

◎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

◎着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全面小康、 制度文明与 党的建设

QUANMIANXIAOKANGZHIDUWENMINGYUDANGDEJIANSHI

广东教育出版社

张志明 著

F124.7
Z254

全面小康、制度文明与党的建设

JIANMIANXIAOKANGZHIDUWENMINGYUDANGDEJIANSHI



广东教育出版社

张志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小康、制度文明与党的建设 / 张志明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6

ISBN 7-5406-5415-5

I. 全… II. 张… III. ①小康—建设—研究—中国 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 F124.7
② 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1950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90 000字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5406-5415-5 / F·31

定价: 23.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引言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下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简称为“全面小康”），并强调这一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全面小康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是一个提得非常及时的重大命题，它无论对中国共产党新的百年命运，还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都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境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宽阔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以及重新审视领导这一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我们看到的是一派充满光明与锦绣的崭新天地。这一崭新天地的开辟，是要归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巨大方法论力量的。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三个代表”的恢弘气度和高远眼界，如果没有“三个代表”的全新理论觉醒，是很难如此高屋建瓴地及时以制度文明的视角提出全面小康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并

很快在全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共鸣的。

由此可以看出，全面小康社会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绝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它的意义更不仅仅是让各个地方去急于描绘20年后该地的GDP是多少、人均拥有多少小汽车多少住房多少手机、企业的数量增加多少、外资的引进增加多少、平均亩产增加多少，甚至每个农户养鸡养猪比现在增加了多少等等。十六大召开不久，个别地方为了显示迅速“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积极姿态，纷纷出台了许多重大“决策”，有的地方竟然豪情万丈地放言该地区要提前10年根除某种传染病，以作为提前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医疗战线目标（这次SARS充分证明，根除某种传染病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说了算的事情）。这种做法对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是无益的，反而让人很容易回想起“大跃进”时期争相放“卫星”的情景。很显然，这样去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把这一重大的理念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浅了，因为中共十六大不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更不是国务院的经济工作计划安排，而是中共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最高权力机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包含了对23年经济发展过程的教训的反思，甚至凝聚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优秀中华儿女关于发展这个永恒主体的理性反思。所以，全面小康是一个具有政治哲学理念的重大命题，是中共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在执政理念和领导理念上的重大突破，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完善和发展，是对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是中共关于如何更好地领导中国社会实现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庄严承诺与宣示。

一句话，全面小康实质上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任务，庄严地摆在了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面前。

从十六大提出全面小康的战略决策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从容，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成熟和从容，感受到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成熟与从容。走过了80多年风雨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像一位沉淀了无数奋斗艰辛与沧桑的智者，高擎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光辉旗帜，引领着她伟大的人民坚忍不拔地向着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发，向着坚信能够真正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目标进发。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伟大的队伍里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李莎 罗志梅

责任技编\肖作勤

美术编辑\范霓

目录

content

引言 / 1

从“富国强兵”到“全面小康” / 1

发展：近代中国的沉重主体 / 2

毛泽东率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 9

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 15

“总体小康”的实现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24

全面小康的社会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 / 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 / 38

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 46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不断实现社会公正 / 65

发展一个让人民越来越有安全感的社会 / 79

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 89

把中国社会发展引入制度文明建设的理性轨道 / 101

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成 / 102

制度文明的概念界定与基本内涵 / 108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 / 113

制度文明的要素构成与基本特征 / 119

制度文明的内在标志与外在标志 / 133

构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文明 / 154

经济制度文明是制度文明的本源 / 155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 / 166

2020 年：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175

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195

政治文明是中国政治制度文明的根本法理基础 / 196

以依法治国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结合 / 202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213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 222

发展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239

文化、先进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240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意义 / 2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 260

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263

党的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败的关键 / 27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 275

依靠党的先进性切实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 281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 282

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先进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

根本要求 /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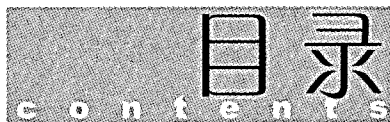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时代内涵 / 288

阶级结构的变化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 291

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 295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 301

党的先进性最终应体现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	306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到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 /	306
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内容 /	314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把握的问题 /	321
着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327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特定内涵 /	328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331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历史探索与初步改革 /	333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339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实思考 /	341
根本在优化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机制 /	344
以党内选举制度的突破促进党内理性政治代谢机制的建立 /	355
结语 /	362



从“富国强兵”到“全面小康”

全面协调发展的全面小康社会理念的形成，是经过了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曲折探索的，甚至是凝聚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华优秀儿女为复兴民族而苦苦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复兴中华民族，也只有凝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这些文明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和执政理念上，就是要在领导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及时实现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造就越来越多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成熟的政治公民。党的十六大形成的这种全党共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极其深远。

发展：近代中国的沉重主体

全面协调发展的全面小康理念，是凝聚了近代中华儿女孜孜奋斗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换句话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在近代被迫卷入世界浪潮的、在屈辱中奋起追赶发达国家的古老大国，如果没有自洋务运动以来历代先辈的苦苦探索和奋斗，甚或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悲壮的失败，中国人民也许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真正形成全面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才能积淀成中共十六大这样的从容、成熟和自信。

当世界最古老的几大文明都消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的时候，古老的中华文明却历经劫难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中华民族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多次执世界文明之牛耳，直到17、18世纪之交的清王朝盛世之时，中华民族不仅文化大国的雄风依在，而且经济强国的威仪依然凛凛，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位居世界前列。但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几近一夜之间遭遇了千古未有的变局，步入了半殖民化的苦难岁月。巨大而惨重的失败，一方面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给近代以来仍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参照，它迫使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不情愿面对的残酷现实：中华民族已经落伍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再不奋起救亡图存、知耻而后勇，中华民族就将亡国灭种。

也就是说，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成了近代以来所有中华优秀儿女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长达八十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中，我们的先辈们不仅想依靠他们的

智慧和奋斗完成拯救民族的任务，而且也极力想励精图治以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重执世界文明之牛耳。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君民共主”的戊戌变法，再到“共和民主”的辛亥革命，无不体现了三代优秀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但是到头来，民族生存的问题都未能解决，更别谈实现国家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了。从先辈们八十多年求生存、求富强的急切脚步中，除了悲壮的民族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色彩之外，很难形成重构中华文明的全面发展的成熟理念。当然，在当时处于保国保种的民族危难之秋，也不可能产生这样从容不迫的发展理念。

中国近代第一代优秀分子的救国发展理念，就是“富国强兵”；其指导思想则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

这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之下所作出的第一个比较切实的应世方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为什么打败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穷兵弱，器物不如人，我们把人家的好东西学过来变成我们的好东西，不就使自己也强大起来了吗！西方列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吗！所以，“富国强兵”的发展理念和“师夷制夷”原则很快为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普遍认同，在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内忧外患威逼下，这一原则也得到了清王朝统治者中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接受和支持，并直接引发了后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除包含了从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大力培养本国技术人才的内容外，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还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注重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他们从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要在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而且更要在经济上师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自握利

权积蓄财力民力与外国竞争，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而只有商战获胜，才会真正有可能在军事上占优。

但他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强烈爱国之举，却处处遭遇到封建制度的羁绊和地主阶级顽固保守势力的压制、排挤和打击。即便当时重权在握深得大清皇权信任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处处受到上层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掣肘时，根本无法全力投入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不要说那些民间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了。而且，随着洋务运动越走向深入，这种掣肘就越激烈。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军事上的继续惨败。肇始于1894年、历时8个月的甲午战争，大清帝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精心装备起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部队更是连遭败绩，最终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为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使先觉者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的话，那么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意味着这种灭顶之灾已经变成了现实，并宣告了以洋务运动求得“富国强兵”的“中兴”迷梦已经彻底破产。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国家的物质技术和工商之道，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的，更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发展和重新复兴。因此，政治制度的近代化，便成了摆在所有当时先进的中华优秀分子面前的再也无法回避无法折衷的严峻问题。

这是近代中华优秀分子第一次在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即要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不仅要实现商品经济（富国）和军事工业（强兵）的发展，而且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政治发展。换句话说，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政治制度，而器物技术只不过是辅助手段；只有改革专制政治制度，才能为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以发展军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初衷，却引发和导致了发展政治民主的强

烈诉求，而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则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涓涓溪流迅速演变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于是，在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和极力倡导下，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模式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君主立宪改良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序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救国发展理念主要是通过政治改良以实现政治发展，从而为民族的复兴提供制度前提，为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开辟道路。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君民共主”。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而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良主义宪政主张，其核心是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民主，设议院定宪法，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由于缺乏宪政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兼之封建传统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缺乏人民大众广泛认同和支持的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所以仅仅存活了百日便告失败了。维新志士的热血警示国人，企图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体制内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企图依靠一个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去搞政治改革，去靠它革除自己的特权而让位给人民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幻想。

于是，近代中华第三代优秀分子在继承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觉醒。他们的救国发展理念依然是政治发展，只是在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彻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幻想，而毅然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民族志士坚定地相信，只要通过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只要凭一纸约法来制约革命军领袖在革命胜利后争做皇帝的梦想，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就能够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铺设康庄大道。他们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或许在当时也不可能有),对中国汪洋大海般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大和顽固及其对民主事业的深层瓦解力和破坏力估计不够,对于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破坏力进而为民主政治培植适宜的土壤更是不可能有理性的把握(其实这种认识的深化一直伴随着中国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公元1992年我们才取得了对这个问题的自觉,才真正从一味通过政治变革来发展民主政治的迷谷中走了出来,才真正找到了中国民主事业建设的理性支点即经济制度的创新,当然,这是后话)。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必将在日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为封建专制势力所毒害和愚弄。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3月11日,孙中山正式公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终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此欢欣鼓舞,以为铲除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就为宪政民主建设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就可以放开手脚实现无数宪政民主奋斗者以前所没有条件实现的抱负和理想了,可以在最先进的共和民主政体下,通过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科学技术建设的努力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了。但是,后来残酷的现实宣告了这种幻想的破灭,建设民主政治的种种努力一次次受到重挫,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仅没有体现出人民期望的民主政治的任何优越,反而由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带来了政治秩序的日益混乱,国家毫无起色,人民痛苦不堪。于是,多年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寄托和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也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

^①《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革命的结果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不是真正的民主福音，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甚至比慈禧太后统治的前清时期还要酷烈。孙中山先生在痛心疾首中，开始了对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冷静反思，并在1914年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重申了以前曾提出过的三段革命程序论，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并将其修改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其中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宪政民主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待地方自治完成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孙中山在生前反复强调了“训政时期”的必要性，他认为由军政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时期将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只有实行了他所讲的“训政时期”，就能够避免过去民主悲剧的再次发生。

然而，孙中山怎么也不可能预想到，他煞费苦心力图保卫民主果实的“训政”，不仅没有成为国民党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准备，反而变成了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合法”借口和理论依据，并最终蜕变为蒋介石个人极权的党国政治、特务政治……林伯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感慨地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清帝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①

民国初年经过无数牺牲奋斗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在转瞬之间被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化为了泡影。就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政治家们为护国护法而苦苦斗争的时候，一些一直致力于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却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底蕴开始了对这次失败的反思。他们认为：袁世凯破坏共和的行为，之所以被许多人所认同，甚至被一

^①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